

“AI 焦虑”与历史主体性的重建： 人类异化的困境与出路

阿 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当代社会广泛存在的“AI 焦虑”现象, 实际上反映了技术忧虑掩盖下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与异化问题。就历史理论的维度而言, 自人类开始思考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技术还是人类本身以来, 技术决定论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矛盾便始终存在, 并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马克思从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 对异化过程进行深入剖析, 揭示出在过度追求物质价值的社会体系中, 由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出现错位, 会造成由物质主导的权力关系对人类力量的系统性压迫。要化解此类源于异化的焦虑, 便需回归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框架中, 重构历史的主体性。在重塑人与技术关系的过程中, 历史学可以在思想层面的理论支持、现实层面的经验镜鉴和价值层面的评判体系三方面提供支持。人类对意义的主动建构能力, 尤其是体现在历史意识中的思想赋义能力, 始终是其区别于数智化技术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 “AI 焦虑”; 异化; 历史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89.1;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6) 01-0139-08

在当今时代, 人工智能的研发和使用均得到迅猛发展, 从日常生活中的智能语音助手到医疗诊断、金融分析等复杂领域, 都有其广泛应用。然而, 与此相伴的是同样广泛存在的“AI 焦虑”现象。众多领域的从业者对 AI 心怀忧虑, 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 丧失自我价值的阴霾笼罩心头。这种看似针对 AI 这一技术工具的焦虑, 实则是人类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它不涉及价值判断, 理应是帮助从业者提升工作效率、更好地完成工作的工具。但现实是, 人们开始恐惧工具, 害怕被工具取代。这反映出深层次的理念危机——人类将自我异化为工具, AI 则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技术工具, 而是“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①, 被反向投射为有能力解构一切人类事物价值的新主体。由此, “AI 焦虑”的重心甚至会从“人类是否还能创造价值”滑向“人类的存在是否还具有价值”这一更为根本的存在论恐慌。

马修·科申鲍姆 (Matthew Kirschenbaum) 已提出“文本末世” (Textpocalypse) 的概念, 认为随着 AI 的普及, 机器所生成的文本可能会替代人类所写的原生文本, 甚至冲击原生文本及其创造者所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 (2025YZDJ003)。

作者简介: 阿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121 页。

传递的价值观念。^①有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谎言、假新闻、人性弱点和机器幻觉将相互激发,削弱人对于事实和可信世界的承认”^②。而在历史理论的维度上重新确立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或可成为化解“AI焦虑”、丰富人类智慧思索的有效路径。在历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已开始思考AI发展为学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们或从历史研究实践的角度出发,通过将AI实际应用于对历史问题的考察,归纳和总结AI在史学实证与历史比较方面的应用潜力;^③或从史学方法探索的角度出发,在将AI视为提高学者历史研究效率的工具的基础上,探讨AI在史学研究发展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④又或从概念发展史与历史接受史的角度出发,关注人类有关AI的历史想象与现实互动的演变历程,探讨AI与人类交流对话的历史过程。^⑤

有关研究的确增进了历史学界对AI的理解,使学者有望更好地把握AI技术,推进AI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融合。不过,既往讨论尚未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层面关注历史研究中的“AI焦虑”现象,探讨AI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由此,有必要引入历史理论的视角解读“AI焦虑”现象的实质,关注原本作为知识生产辅助手段的AI技术,如何逐渐化身为与人类对立的“他者”,进而被视为“典型的、比他优越的、可以作为比他高一层次的存在物”^⑥,甚至引发众多学者关于“智人的终结”^⑦的担忧。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定位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进步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关注历史学科在克服异化、重构人类价值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一、人与技术“对立”的历史脉络

当下AI在学术和公共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内涵与外延在跨学科发展中日益丰富。有学者将其视为“在某些方面具有类似于人的智力”^⑧的存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对大数据的高速运算能力,即所谓算法,一个纯粹的技术活”^⑨。而在AI研究领域,业内较为认可的是将AI定义为“一种未必能明确理解人类设定的目标,但能够为此目标谨慎行动、寻求授权,通过观察来理解人类偏好并服从人类控制的机器”。换言之,它是“对人类具有实际助益的工具”。^⑩可见,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对AI的认识各有其侧重,但普遍承认的一点是,AI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手段或工具。由此,“AI焦虑”可被理解为一种技术忧虑,反映的其实是人与技术的“对立”。

从历史理论层面审视,人类关于人与技术之间“对立”关系的思考其实由来已久。这种“对立”关系并非现代科技时代所独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反复出现并持续演变的现象。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指出,在古代社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人类基本生存

① Matthew Kirschenbaum, “Prepare for the Textpocalypse,” *The Atlantic*, March 8, 2023,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3/03/ai-chatgpt-writing-language-models/673318/>.

② 杜骏飞:《奇幻社会的来临——DeepSeek 幻觉与后真相递归》,《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③ 白珊珊:《人工智能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应用》,《光明日报》2025年6月23日,第14版;秦蓁:《相知与定名:人工智能(AI)时代的图像、文献与历史》,《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陈超、李赫孜、杨泽坤:《基于深度集成学习的战国楚系简帛文字识别》,《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2期。

④ 王涛:《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历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梁晨:《从理论倡导到研究实践:数字史学未来走向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⑤ Silvio Bär and Andriana Domouzi, e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Greek and Roman Epic*,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4; 顾晓伟:《在“历史仿真”中坚持“如实直书”——历史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朱悦、林展:《史学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双向互动——以大语言模型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3期。

⑥ 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1卷,范捷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⑦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⑧ 王宁:《AI时代的智力物替、主体重塑与结构转型——一个人工智能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⑨ 尚杰:《AI时代的文科向何处去——兼论新型心学建构的可能性》,《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⑩ Russell S. J., Norvig 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4th ed.,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21, p. 23.

需求，如火的使用、石器的制作等。这些技术发明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使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生活资料是由一系列顺序相承的技术使之增加并臻于完美的；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便产生一种新的技术，它们多少直接同发明和发现有关。”^①与此同时，人类“在心智方面的能力也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进化”^②，逐渐意识到技术对自身生活的潜在影响，开始思考历史与社会的普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认为，“人类通过一系列技术进步，从野蛮逐步迈向文明”的技术决定论，不仅是古希腊人看待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③还在古代世界广泛流传，在古罗马、古代近东等地衍生出关于“人类如何获得技术”，并通过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观念。^④

当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被视为一种能够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时，人类的主体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和质疑。面对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似乎逐渐失去了对自身行动和历史进程的掌控力，转而成为技术逻辑的附庸。自古以来，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伴随着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新定义和审视，人类不得不在技术的浪潮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现代学者注意到，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⑤的著名论断，不只是“在伦理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代表”^⑥，其实也表明古希腊人对现实世界与抽象概念中人类自身与技术等外物之间对立的感受，“这一命题强调了两种对立性质能够而且确实能够在同一个被感知的对象中存在”^⑦。这不仅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更暗示了技术等外物需以人类尺度衡量的认知框架，为后世将人与技术加以明确区分的思想传统埋下伏笔。尤其是普罗泰戈拉对“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和“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强调，更反映了当时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依赖与束缚，更深入精神层面的迷茫与挣扎，成为贯穿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关于人与技术相互“对立”的观念古已有之，伴随社会发展，在历史理论层面持续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模式。当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提升、人类的物质财富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时，人类关于历史发展的思考便会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技术决定论，即强调技术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人作为技术运用者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由此，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主体的人，其作用在历史观念中被削弱，从而引发了人类对技术进步的忧虑与反思。

例如，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思想家朱里安·奥弗鲁·德·拉·梅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撰写了《人是机器》，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本质上都是如机器般的物质实体。所谓的“灵魂”不过是肉体所产生的附属品；“心灵”也只是有机体特别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思想只是大脑机械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他将人等同于机器，将人类的活动等同于机器的技术功能，不仅相信“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还强调要完善作为精妙机器的人类，则必须依赖技术，“需要花费更多的技巧和更多的工具，才造成和维持一架在整整百年之间表现心脏和精神的跳动的机器”。^⑧拉·梅特里的观点虽然是一种有瑕疵的机械决定论，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田崇勤等学者认为，拉·梅特里关于人与外物关系的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页。

③ Arnaldo Momigliano, "The Origins of Universal History,"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Classe di Lettere e Filosofia*, Vol. 12, No. 2, 1982, pp. 533-560.

④ 阿慧：《莫米利亚诺的西方古代“普遍历史”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⑤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增订版）》第7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⑥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⑦ 赵本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新解读》，《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⑧ 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5页。

技术化思考有一定可取之处。^①但拉·梅特里的主张引发了伏尔泰的强烈批评，后者抨击其想法“没有半页是有意义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所写的东西具有什么性质”，并称“理智的人们指出他堕落得无可救药”。^②作为理性主义先驱的伏尔泰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③，认为人类的理性才是历史的前进动力，而非单纯的技术进步所能比拟。^④在他看来，技术虽然为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若将其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或主导力量，则无疑是对人类理性的极大贬低，甚至会诱人“对各种邪恶发生兴趣”^⑤。

可见，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会带来人类生活的巨大变革，也将持续引发关于技术是否将取代人类主体性的忧思。人类对技术的运用不仅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并使人质疑自身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对技术进步的恐惧是人与技术“对立”关系下的焦虑投射，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人类因社会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问题：一方面，技术从帮助人类更好生活的工具异化为人类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本应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人类，其主体意识遭到削弱，将自我异化为工具。

二、马克思历史理论视域下的“AI焦虑”与人类异化

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意识虽然在历史理论领域中长期交织缠绕，但在马克思之前，尚未有人清晰地阐述过这种“对立”的成因及其不合理之处。马塞洛·默斯托（Marcello Musto）指出，尽管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分别从个体的精神异化与信仰的宗教异化等方面对异化概念进行过阐释，但在马克思之前，它尚未真正进入历史与哲学领域。即使是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思想家，也大多将异化视为一种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无须过多关注。例如，海德格尔便认为异化是“一种在世之在的存在范式”，是构成历史基本维度的一种现实状况。^⑥唯有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中关于异化的论述，从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角度，系统地指出了人与技术之间“对立”张力的形成过程及其不合理性。

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系统阐释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指出，理想的现实劳动过程应当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生产者，自主地利用生产技术或使用生产工具，通过生产实践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然而，所谓异化，则是指作为劳动与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类，在物质主导的、与现实生活需要相背离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权，从而不仅失去对劳动工具的掌控，也失去对劳动目的和价值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之外存在”的异常事物，进而“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与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⑦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可以运用于生产的技术手段或工具，还是劳动所产出的产品，甚至是劳动者自身，都无法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完成理想的劳动过程，而是被卷入“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⑧。不仅如此，当人类及其生产活动进入这种已被异化的生产关系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物质生产—再生产”的循环往复，异化生产的矛盾会逐步积累并愈发复杂。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手段或生产工具之间，以及人与其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对立”会日益突出，甚至走向敌对。

① 田崇勤、张传开、杨善解编著：《简明西方哲学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9-140页。

② 斯蒂芬·G.塔伦泰尔：《书信中的伏尔泰》，沈占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第114页。

③ 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④ 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书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⑤ 斯蒂芬·G.塔伦泰尔：《书信中的伏尔泰》，沈占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第114页。

⑥ 马塞洛·默斯托：《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衍变》，田笑楠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8日，第3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①因此，正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会出现异常的分裂与中断，造成“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②的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手段或工具本质上是中性的，是人作为主体在理想的劳动过程中实现生产目的、创造劳动产品的途径，而非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本不存在与历史主体竞争或“对立”关系。人与技术之间所形成的竞争或“对立”，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走向了过度追求物质价值甚至物欲至上的历史误区，这导致技术价值提升、人的主体性下降，从而引发了劳动异化的矛盾。这种异化既包括技术升格为与人形成所谓“对立”关系的“类人”主体，也包括人的主体性下降乃至丧失，沦为有生命的“机器”。

可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阐明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在过度追求物质价值、由物质主导的社会体系下，原本应解放人类的技术和工具，反而对人类造成系统性压迫。在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和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类不仅感到自身生产、生活陷入失常，还误将技术与工具的发展视为扰乱人类生活的因素：“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③

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想生产过程中，“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根本属性；异化劳动则是背离这一自由自觉本质的生产活动，它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身体以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④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旨在提升生产效率、助益人类生产生活的技术一旦经过异化，自然也就引发人类的担忧、焦虑，乃至反感、厌恶。就此而言，如今的“AI 焦虑”正是技术异化在当下时代的具体表征。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有关异化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启发历史理论界对“AI 焦虑”与人类异化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当人类过度追求物质价值，乃至因过度依赖物质而出现“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⑤的异化现象时，现实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便不只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更新，还可能成为引发“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⑥的风险因素。因此，当人类被物欲裹挟，走向意图征服全部物质世界的极端，特别是开始渴望获得客观的现实化时，便可能陷入“大写的技术”（la Technique）统治世界的思想危机之中。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成为同自然相斗争的真正场域，而大写的技术则试图改造一切。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自然科学和历史人文科学、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都被置入这场注定要将整个行星卷入其中的竞赛中。这一进程似乎甚至在危机前面都无法停下来，即便这种危机暴露出虚无和虚无主义的危险”^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 AI 技术将人类历史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情感体验数据转化为“死劳动”的数据形态，再通过大数据运算对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活劳动”形成反向规训，并借助“逻辑优化”之名，使主体逐步将思考历史经验的自主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58 页。

④ 宋惠芳：《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69 页。

⑦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马克思：技术思想家——从人的异化到征服世界》，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 页。

交付给 AI 算法时，人类便可能失去衡量物质世界和自身价值的历史尺度，最终沦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①。

不过，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技术和工具的异化并非不可逆转的现象。相反，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合理重构及对技术应用方式的充分规范，人类可以重新确立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强调，机器体系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而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 AI 在物质依赖的裹挟下，试图垄断一切数据、以交互式模型为名重塑智力劳动分工时，它便成为技术异化的助推器；然而，若能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重构，AI 则可以复归于缩短劳动时间、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人类解放的“一般智力”功能。^③

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角度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技术和工具的边界，重建人的主体意识以抵抗异化。一方面，人类需要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技术的批判性思考，避免盲目依赖技术而忽视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人类还需要在保持自身历史主体性的基础上，为中性技术与工具实现有效赋义。这不仅包括合理利用技术，使其服务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更包括对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对人类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可以将技术重新定位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非支配性的异己力量，从而实现技术与人类主体性的和谐共存。这种对技术和工具的重新定位和赋义，不仅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应对当代“AI 焦虑”的重要策略。

三、史学研究化解“AI 焦虑”的独特价值

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框架下，技术的异化现象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人类过度依赖物质、急于寻求生产效率提升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在历史与社会关系之中逐渐陷入异化状态的鲜明体现。因此，面对当前的“AI 焦虑”问题，不能仅仅从技术本身寻找解决方案，而需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视角出发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审视和思考。唯有如此，才能在真正理解“AI 焦虑”本质的基础上，探索出化解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变迁的学科，在克服技术异化、重构人类价值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具体而言，历史研究可以从思想、现实和价值三个维度，为化解“AI 焦虑”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深化历史理论思考、充分反思历史实证经验，不仅可以深刻洞察技术更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还能为构建理想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启发。

历史学的首要价值在于为理解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思想基础。历史工作者通过史学观察和考据，既能解读历史现象、呈现历史事实，又能赋予历史意义，从而为理解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更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理论参考。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理论的思考为例，他通过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细致解读，揭示了技术自古以来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生产工具或手段，与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推动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例如，马克思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内容时，专门调整了原文的顺序，梳理出古代人类依次通过掌握渔猎、引火、造弓箭、制陶术、驯养动物和冶铁术等一系列技术发明，从原始的蒙昧期、野蛮期逐步进入文明期的历史过程，由此强调“生存的技术”在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即“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他们（即人们）在这方面——生存的技术方面——的巧拙”。^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2页。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他还通过论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说明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都在从生存与生产实践出发，充分利用技术和工具，通过劳动实践，不断推动历史的发展，逐步实现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梳理，从宏观上为我们理解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历史学的第二个价值在于为化解“AI 焦虑”提供现实层面的经验支持。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技术危机，这些危机引发了思想震荡和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行为。例如，技术革命后，理性的失落与战争的阴云引发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关于“人类没落”^③的思考；在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提出了关于“历史终结”^④的论述；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是明确宣告“人终将被抹去”^⑤；等等。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虽然会给人类带来短期的冲击，但人类社会最终能够通过调适和创新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并不会因技术更新而停止，人类总能通过对技术发展的合理定位而找到更为广阔的生存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⑥ 历史研究正为人类提供了追溯过往、重塑当下的契机，使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分析，找到应对当前“AI 焦虑”的现实依据。

历史学的第三个价值在于为化解“AI 焦虑”提供价值层面的判断依据。当海量的数据和庞杂的信息干扰事实判断，使技术手段本身失去可靠性和可信性时，人类对历史的考察与思索能够提供人文科学的智慧评判标准，从而保留人类思考的价值。历史学通过历史叙事的建构，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意义。例如，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⑦的命题及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的主张，其实都隐含着人类对自我思想的关注和对自身所处世界的反思。这些观点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史家对人类历史主体性的认同，它们为应对“AI 焦虑”导致的价值体系动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

不仅如此，当连贯的历史叙述能够被 AI 生成时，人类史家进行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也将愈发明显地体现在意义赋予上。莫米利亚诺指出，人类对历史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在创造价值：“提出观点一事本身即具历史性，历史由此自成其意。”^⑨ 人类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权利，本质上就是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证明。近来的数字人文研究显示，AI 生成的历史文本缺乏经历主观体验后的共情投射，甚至存在“在将劳动者的私人情感进行剥夺的同时对其进行数字化改造”的风险。^⑩ 这反向映衬了人类历史意识的不可替代性。由此可见，正如莫米利亚诺所强调的，唯有人类才“有能力，并且有权利在证据的基础上去审视自己的过去”^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③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④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⑤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3页。

⑦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⑧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⑨ 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y in an Age of Ideologi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51, No. 4, 1982, pp. 495–507.

⑩ 马超：《论数字资本主义情感劳动新异化及其消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6期。

⑪ Arnaldo Momigliano, “History in an Age of Ideologi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51, No. 4, 1982, pp. 495–507.

结 语

在当今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中，“AI焦虑”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担忧，更揭示了人与技术之间深层次的“对立”与异化问题。通过对历史理论的梳理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发现这种“对立”并非现代科技的特有产物，而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重要议题。从古代社会对技术的初步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再到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深刻洞察，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博弈在历史的舞台不断上演。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视角，使我们认识到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以物质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体系，而非技术本身。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技术由解放人类的工具异化为压迫人类的力量，而人类则逐渐失去了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掌控。然而，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异化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合理的社会结构重构和技术应用规范，人类可以重新确立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技术重新定位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的价值不容忽视。历史学不仅为我们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还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为化解“AI焦虑”提供了历史借鉴。更重要的是，历史学通过对历史叙事的建构，为技术发展提供了价值判断依据。在AI生成的历史文本缺乏共情投射的当下，人类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权利和历史意识的不可替代性愈发凸显。面对“AI焦虑”，我们不应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沼，而应从历史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历史学的智慧，我们可以在思想、现实和价值三个层面上，为构建更加理想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技术的浪潮中坚守人类的主体性，实现技术与人类的和谐共存，让技术真正成为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助力。

责任编辑：刘 莉